

乡村社会个体化：春节流变的叙事与隐喻

——基于一个鲁东南乡村春节的政治社会学考察

李 山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春节是社会生活的展演场，是展现社会变革的舞台。乡村社会变迁推动着乡村春节流变；乡村春节流变亦会映射着乡村社会变革。春节流变的直接感受就是“年味”淡了，年味变淡体验的背后却是春节所展演的乡村社会变革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变迁。在社会转型期，乡村春节流变无不折射出乡村社会个体化的隐喻。在乡村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从传统社会范畴和义务中“脱嵌”而出，过着“自我”生活，“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目前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亟需通过国家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路径，实现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再嵌入”。

关键词：春节流变；个体化；第二现代性；再嵌入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 (2014) 06-0001-07

春节起源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社会自然便是庆祝春节活动的舞台。历史时空下的乡村社会不断嬗变，春节之礼俗也不断丰富与变革，回应着乡村社会发展，承续着中国文化。可以说，社会发展驱动着乡村春节流变，乡村春节流变映射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由于春节承载着一定的政治社会意义，乡村春节流变必然反映出乡村社会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迁。

一、记忆中的传统乡村春节

春节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最为期盼的节日，也是我国传统礼俗集中展演的“狂欢节”，承载着浓重的政治社会寓意。进入农历腊月，春节脚步声由远及近渐渐在人们的耳边响起，人们怀着无限喜悦心情，内心充满了期待，每个人步入春节心理准备期，为过好春节做着谋划。转眼间，时间延至腊月二十三，过年仪式渐渐拉开了帷幕，“除夕和正月初一”达到高峰，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结束。

“辞灶”为春节的起始，“辞灶”的日期在村庄里各异，有的人家腊月二十三，有的人家则腊月二十四，据村内老人讲，“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官辞三，民辞四’的习俗”。“辞灶”这一天，每家每户都兴高采烈地制备晚上“辞灶”用的供宴。每家的辞灶仪式都安排在晚上，在灶台上摆好各种食物，其中必有一种特别粘的麦芽糖做祭品，当地人称之为“辞灶糖”。村民们希望吃了“辞灶糖”的灶神用甜甜的嘴巴向玉皇大帝讲些“甜言蜜语”以企盼降福，同时，也希望用“辞灶糖”的黏稠性粘住灶神可能向玉皇大帝讲自家坏话的嘴巴以期驱祸。人们在灶台旁边的墙壁贴上新的灶神画、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神仙图与春耕图，在灶台下方的地面上放好几卷印有方孔钱币印迹的烧纸和一些黄豆秸秆，这些“钱”是给灶神上天言事的盘缠和馈赠。“辞灶”仪式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在庭院里燃放一挂鞭炮，祭灶仪式正式开始，男性家长将灶台上的贡品用筷子夹一点放到灶台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SH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1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4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KS026）。

作者简介：李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化治理与乡村治理；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文化治理与乡村治理。

地面上,之后便点火焚烧准备好的烧纸,最后由男性家长带领男性家庭成员向灶神叩头,恭送灶神上天过年,期望明年给自家带来好运。

“辞灶”过后,每家都在为过春节做着各种准备,清洁庭院,拆洗被褥,蒸制食物,书写春联。写春联是一项村庄的公共活动,由村集体统一组织,通常由村干部组织村里有毛笔书法的文化人,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免费为村民书写春联。除夕临近,来这里写春联的村民川流不息,孩子们在这里打闹嬉戏,村民们在这里挑选着新年祝词,在淡淡墨香之中飘荡着欢声笑语。除夕之前,村民们纷纷去赶“年集”制备各种年货。在一年之中规模最大、商品最多的集市里,长幼熙熙,人流攘攘,议价声阵阵。村民们满载过春节所需的年货笑容绽放,孩子们抱着自己喜欢的玩具笑语盈盈。在一定程度上,年集也是乡村的“公共空间”,久违的不同村庄的朋友在年集相遇,在欢闹鼎沸的杂音笼罩下喜悦地交流着这一年的欢喜和经验及下一年的展望和践行。

“上坟”是春节期间乡村最重要的祭祀仪式,每家都会准时给逝去的老人上坟。由于历经数次政治运动,村庄家庙早已破旧不堪,家庙所承载的文化寓意也早已淡忘。每家只是去自家坟茔上坟。上坟表达了对祖宗先辈孝敬和怀念之情,体现着“百善孝为先”和“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每家都制备一桌丰盛的酒席,带上印有古钱痕迹的烧纸和鞭炮,领着本家男性成员,去本村公共墓地的自家坟茔祭奠祖先。人们通常用扁担挑着装供奉先祖过年酒席的木匣徒步前往墓地,几乎没有人用机动车代步去上坟,以免打扰祖先的灵魂。几乎所有家庭都在腊月二十八左右上坟,这几天去坟地的道路上,人们络绎不绝,平时许多很少见到的人出现在彼此的面前,相互打着招呼,彼此寒暄着。北方冬天的墓地没有半点绿色,光秃秃坟茔高低散落在西下的斜阳中,伴有阵阵鞭炮声的凛冽寒风中飘舞着纸钱焚烧后的烟灰,凄凉肃穆的氛围笼罩着坟地。穿过布满凌乱枯草的墓间小道,找寻到自家坟茔后,家长会告知他的后代这是谁的坟头,好让他的后代记住,当看到和自己一起共同生活过已逝去的亲人坟茔时,逝者的音容笑貌就会立刻浮现在眼前,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无奈哀思与深深怀念。随后给每位逝者摆上过年酒席,燃放鞭炮,祝愿他们生活幸福,祈求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其儿孙万福。祭奠完毕后,从辈分最高逝者开始依次叩头作揖行礼。上坟祭祀仪式结束后,通常会在本村的墓地里游走一番,与同来上坟的同村人共话先辈生活经历,缅怀过去,感想连连,宗族与村庄共同体意识油然而生。有的人家还会连续三年把新去世的老人请回家中一起过年,以寄托对逝者的无尽哀思眷恋,抚慰家人因突然失去亲人所带来的感情创伤,同时也体现着家庭共同体意识,传递着传统孝道文化。春节上坟祭祀祖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具有重要政治社会内涵,培育“家”的意识,理清“自己来自那条河”的流向,教化后人饮水思源,尊祖敬老。

除夕下午,每家会把写满新年祝词的春联贴在门上,“福”字布满庭院,满园飘红,气氛浓浓!华灯初上,一家人或在炕头或围着火炉忙于包正月初一吃的饺子,夜话徐徐,笑语阵阵,其乐融融。孩子们整理着新年穿的新衣服,盼望着新年的美食及玩耍的快乐,过年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高兴至难以入眠。当时钟指针转到正月初一零点以后,男性家长会起床“发纸”,鸣放鞭炮以驱恶求吉。

“爆竹声声除旧岁”,在响彻夜空的鞭炮声中开门纳福,初一拜年活动便拉开了序幕。初一拜年是按照传统儒家血缘伦理关系差序展开的,拜年首先在家庭内部进行,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间也相互拜年祝福,尔后“三服”内家庭成员彼此拜年并聚集为群,去给未出“五服”的长者拜年,最后则给五服之外的长辈及亲朋好友拜年。拜年的人群在村庄曲折崎岖胡同里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相互问候着,彼此祝福着,脸上岁月侵蚀的“年轮”在愉悦笑容中绽放着,那些人际间曾有的不和谐皆于谈笑间灰飞烟灭,休戚与共的社群意识自然而然萌发。在拜年习俗中,我国固有的家庭伦理、宗族观念、乡村共同体意识及浓浓乡土情义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强化与延续。新年朝阳初上,外出拜年的人们相继回家吃饺子,吃饺子前要端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到庭院和各个屋里进行祭奠,让各路神灵先吃,以祈求神灵给自家带来好运,彰显着对神灵敬畏之情。早饭后,穿着漂亮新衣服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在村庄里的街道上做着游戏,打闹嬉戏,天真烂漫,童真醇醇。大人们则会到相熟相知的人家喝

茶聊天，交流各自所知信息，评说村庄里的家长里短，评判各家的是非得失，评论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展望新年里的生活愿景。在春节串门聊天中信息得以迅速传播，村民们制造着自己乡村特有的“公共空间”，形成具有强烈束缚力的道德舆论场域，乡村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是非曲直得以论说评判，乡村生活规范共识得以进一步达成，乡村传统道德得以强化。天色渐暗，兄弟朋友相聚喝酒聊天，酒过三巡，醉眼迷离，肺腑之言切切，血缘情义浓浓，皆沉浸于忘我的亲情友爱之中。

初一过后，村民开始走亲戚，已婚人们通常先去父辈姻亲及外婆外公舅舅家拜年，其次去给岳父拜年，最后走姑姨家以及其他较远的亲戚。春节走亲戚，巩固着人际关系纽带，加强着村民与外界联系，扩大着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网络，编织着家庭生活安全网。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村庄会有各种公共活动。村大队会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利用年前冬闲排练一些具有乡土特色且具教育意义的地方戏“吕剧”剧目在年后持续演出。演出的服装道具皆由村集体出资置办，演出的舞台非常简陋，没有舞台灯光，没有舞台布景，就是自导自娱自乐。演出的那天晚上，邻村的村民早已获知演出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戏台前等待好戏上演，戏台前人头攒动，目光交汇，使陌生者相识，相识者相熟，相熟者相爱。戏台上戏说着现实生活，戏台下展演着生活故事。在娱乐设施匮乏的年代，春节期间每晚的露天电影放映便成为村庄的重要文化活动。晚饭后，孩子们便早早地抱着自家的板凳去露天电影放映场占位子，嬉闹着圈画着自己的“地盘”，谈论着昨晚看过影片的情节，比较着用自己压岁钱买的简陋玩具。天色渐渐暗淡下来，露天电影场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的人站在最外层，有的人坐在附近的废弃墙头上，有的人依偎在旁边草垛上。俩人成双或三五成群的年轻人用年轻人的语言挑逗嬉闹，乐此不疲，感情日炙，有的成为情人，有的成为爱人！田野戏台与露天电影场成为村民娱乐场所和增进人际交往平台，在春节氛围下不断上演着乡村生活故事。元宵节过后，春节就正是结束了，人们的生活进入正常轨道，开始忙于生产与生计。

二、乡村春节流变的叙事

伴随我国社会急剧转型，人们切身感受到乡村春节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传统年味变得越来越淡薄，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的春节正处于变迁之中。

市场经济发展，乡村物质生活更加充裕，“忙年”变得轻而易举，许多年货不再需要像物质匮乏年代那样自己亲自制作，如今人们无需为置办年货奔波辛劳，几乎所有过年的必需品都在商场、超市里购买。春节期间，人们游走于各购物场，购买着琳琅满目的各种时兴商品，“勤俭节约”的传统生活观念正被“好好享受生活”的消费理念所取代。城市生活样式及消费主义观念渗入乡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村民，尤其是村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打工”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展演着城市消费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他们穿着时尚服装，玩着最新款手机，驻足在各家超市间，购买各种自己喜爱的年货，修改着乡村春节传统习俗。村民门前停放的不同品牌的汽车标识着这家主人的财富，空中绽放的绚丽烟花在炫耀着燃放人家的富有。可以说，春节既是购物消费的狂欢节，又是乡村炫富的竞技场，借助物质性消费与竞争性炫富，进行着社会性身份的自我确认。

年前上坟道路上，很少见到带着孩童挑着担子步行上坟祭祖的村民，人们或骑着自行车，或骑着摩托车，甚或开着汽车上坟，匆匆无言而过。坟地里散落着冥纸燃烧后的灰烬，坟茔前枯草里洒落着祭奠的饭菜，天空中飘舞着鞭炮爆炸后的纸屑，整个墓地显得空悠悠，无人驻足游走，无人相对话凄凉。现代教育普及与科技理论影响，人们不再迷信神灵鬼怪，对人之生死有着更为科学的世俗化认知。对于上坟祭祖，人们也有一种世俗化的理性认识，逝者已去，一切皆空，生活除自己努力外皆无所依。既然逝去老人不能为其子孙后世提供护佑，他们的灵魂也难以对那些不肖子孙实施惩罚，敬畏祖先的礼教自然显得空洞无物，如今上坟业已成为一种象征形式，甚或负累。一定程度上，在这种互惠理性至上观念影响下，老人再没有原先的威严，社会地位也变得无足轻重，传统敬祖孝亲的孝道文

化日趋弱化。

除夕之夜,没有了大家庭的炉边夜话和促膝交谈,代之的却是都市娱乐电视节目笼罩下小家庭成员的嬉笑。零点的时钟敲响后,黑洞洞的夜空闪烁着点点亮光,稀疏的爆竹声在夜空里回响,之后便进入一片肃静,悄无声息。天已破晓,大部分村民此刻才刚从温暖的被窝里起床,在庭院里,大人们草草地“发纸”,燃放鞭炮,短促的爆竹声再次响起,孩子们则依然睡在梦乡,外面的爆竹及其拜年时能够获得的零食再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在物资充盈的今天,春节更是村民们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形式,几乎无人像过去一样早早起床在冰冷的寒风中披星戴月去拜年,也没有人喜欢在温暖舒适的被窝中被人叫醒,人们更多的是在追求着个体生活的幸福,将个人感受作为生活重要准则。

太阳初上,在噼里啪啦地阵阵稀疏爆竹声中传来了拜年人群依稀的脚步声。街道上拜年的人们匆匆寒暄而过,本是同村人,如今大多却似曾相识。短暂的拜年喧闹之后,空寂的大街仅有几个行人在移动,听不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童音,看不到大人们热情真诚的群聊,村落再次恢复了寂静。拜年群体已突破传统亲属制度的意识形态,跨越宗族界限,更多是以个体关系为纽带组成。拜年对象几乎不再完全按传统血缘伦理差序展开,而是超越血缘纽带按平日交往疏远关系及其对自身未来生活影响重要程度进行选择。每个村民醉心于经营巩固着自己在村庄的个体人际关系网络,初一拜年更具有对某些拜年对象进行感情投资与积聚“社会资本”的动机,以期将来获得某些回报和便利。现今拜年呈现出更多的理性主义考量。

同正月初一相比,初二的街道则繁忙了许多,村庄里的商店超市都已开门营业,甚至各种酒和礼品盒堆放门前路边任由准备走亲戚的过往顾客挑选。带着礼品走亲戚的村民竞相穿过村里的街道,川流不息。现今,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后即刻分家,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过着“方便”与“顺心”的私密性生活。正月初二,已婚男人携同妻子带上礼物给岳父拜年,然后便是其他姻亲的相互拜访,一直大约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村民生活中,小家庭几乎都在苦心经营着“实践性亲属关系”,将姻亲关系纳入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核心区域,在某些程度上,姻亲关系甚至超过宗亲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现象反映出小家庭夫妻关系中女方地位的上升、传统血亲宗族意识的消解及其传统宗亲血缘关系的衰落,同时强化着同计划生育政策一致的生育观。

非集体化后,在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政府对乡村进行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村干部的地位与权威下降,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已显得力不从心,再也没有能力与内在动力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满足个体成员的生活需求,以强化成员个体对村庄的依附性。以前每家每户的春联均由村委会出面组织人员统一为村民免费书写。在接受这种村庄公共服务时,村民能够感受到村庄共同体之温暖,体验到春节特有之氛围。现今这种公共服务已不再有,村民们要么用毛笔自己书写,要么就找写字相对好的村民代写,甚至干脆到集市上购买春联。以前由村里某些体格健壮的年轻人构成的春节夜间村庄巡逻队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给村落带来浓浓春节气氛由村民们自导自娱自乐的乡村戏曲演出早已成为村民们的历史记忆;给村民带来回味无穷生活故事的春节露天电影业已成为饭后回味过去的谈资。现今,村委干部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去关注村庄事务,村民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心思去参与村庄共同体公共事务,正如某村干部所说“村里发生刑事案件就直接拨110,民事案件就去司法所解决,以前由村集体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现今由上级对口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现在人人都更加实际了,年轻人都忙于打工挣钱,关注于自己的生活,哪管他人瓦上霜了。”非集体化后市场理性觉醒,从村集体“脱嵌”而出的个体与村庄共同体纽带断裂,“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①,个体必须为自己生活负责,村民趋于理性化与个体化。

^① 吴理财《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人民论坛》2012年第10期。

三、乡村春节流变的隐喻

乡村春节流变是伴随社会变迁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乡村社会变迁自然会推动乡村春节流变，乡村春节流变亦会深刻反映乡村社会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映射乡村社会深刻变革。春节流变的直接感受就是年味淡薄了，年味变淡体验的背后却是春节所展演的乡村社会生活变迁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如今的乡村春节不断展现出追求个体物质满足与生活享受的人生观、去集体的个体至上的价值观以及理性务实的世俗化的世界观等个体化趋势。春节流变无不折射着乡村社会个体化的隐喻。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快速推动，中国社会步入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期，在现代性意识冲击之下，个体—社会—国家关系正经历着结构性重塑。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趋势下，乡村社会正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个体的崛起，“个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①

“现代性”下乡确立起“个体自我”意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规范不断“去魅”，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走向个体主义世俗话语，乡村社会现代性“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在乡村社会里，现代性个体权利观念、理性功利性主义行为逻辑以及物质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大行其道。村民们纷纷追求自己的独立性，捍卫个体权利，希望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个体幸福。集体至上的意识形态几乎成为村民们实现个体意图冠冕堂皇的外衣，他们不再相信传统集体主义的说教，也不指望在生活保障上长期缺位的遥远国家会大发慈悲，唯一坚信的是每个人必须完全对自己生活负责的理念。乡村社会生活蜕变为个体谋求生活存在而不得不进行必要合作的利益交换网络，更多地充斥着少有传统道德的精打细算的喧闹。乡村社会公共性不断被外在的个体利益诉求“殖民化”，“为自己而活”的个体主义成为人们当然的行为信条。乡村社会呈现出非集体的个体化状态，在这种非集体的个体化乡村社会里，以个体物质满足为核心的幸福观以及以个体利益至上为出发点的价值观具有了合法性地位，成为乡村个体的普遍性追求，人们以个体为核心编织着、经营着、巩固着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将能否实现个体权利与过上个体幸福生活作为思考问题及其处理事务的出发点。

乡村社会流动性扩展个体的崛起空间。乡村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将个体从狭隘空间解放出来，进入流动性的陌生世界，过着自我负责的“流动的生活”。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回缩，农民从集体化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享有较大程度的个体自由，但自由迁徙权依然受到种种旧有体制限制。伴随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急需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人口，1985年国家户籍制度进行适度改革，施行城市暂住证制度，允许农民流动到城市，寻求个体生存机会，谋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大量农民离开村庄到城市打工赚钱。流动的农民工洪流驱动乡村社会空间走向开放，致使广大乡村社会融入现代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当中，强势的现代性持续冲刷着乡村社会传统性的壁垒，乡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不断被重塑。处在流动时代的乡村社会中，一方面广大农民具有大量拓展个体生存空间的机会，生活不再完全依赖于村集体，逐步摆脱了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说的“组织性依附”，同时村庄集体意识以及乡村传统也失去对个体的束缚力，人们从村集体之中“脱嵌”出来。另一方面，“脱嵌”的个体处于现代化造就的流动社会中，过着“流动的生活”，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每个人必须成为“奋斗个体”（triving individual），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个体才是“我的”存在，除此皆为虚无。在流动的乡村社会中，大部分村民过着“流动的生活”，“生活在永不确定环境下的、缺乏

^① 何美德、鲁纳 《“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徐烨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页。

稳定性的生活”^①，长时间在外工作，忙于挣钱养家糊口，无暇在乡村驻足逗留，相互间近乎无接触交往的时间，邻里关系日渐疏远，旧有的某些公共空间成为历史记忆，乡村传统道德舆论场域消弱，无力匡正是非曲直，乡村公共事务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如今，大部分村民更多地关注个体生活，对乡村公共事务保持“理性的无知”。

“个体化显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等西方学者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行深入考察，提出了“个体化理论”，用来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个体化现象。他们认为，个体化乃非绝对性地追求个体性权利、自由与幸福，而是对超越传统共同体更高层的社会制度的依赖，强调一种个体与社会的张力，即一方面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这种个体自由又必须在社会之中获得。

乌尔里希·贝克等西方学者建构起在持续现代化进程中诠释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个体化理论。个体化理论包括脱嵌与再嵌入两个过程，涵盖解放、去魅以及重新整合三个维度。“脱嵌，即个体从历史限定的、在支配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撤出（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再嵌入——其含义在此已转向与个体化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一面——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② 社会持续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个体化自然会产生对传统性的超越与逆反，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脱嵌”（disembedding）。脱嵌含有两个维度：一是“解放的维度”，即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范畴（如家庭、宗族和阶级等）脱离出来；二是“去魅的维度”，即个体摆脱传统性思想以及价值观束缚。脱嵌而出的个体不是居无定所，四处游荡，而是要“再嵌入”（reembedding）到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中，享有的是齐格蒙·鲍曼所讲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便是“重新整合的维度”。

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理论的一部分”^③。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转型以及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继失灵提出的新理论学说，用于阐释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个体化现象。目前西方发达社会业已完成现代化进程并正处在向所谓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古典自由主义主倡的政治解放与个体自由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各国政治实践所践行，现代自由主义倡导的“积极自由”与国家责任为二战后的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所推行，第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国家普遍确立。“在第一现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④ 第一现代性个体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形式中抽离的个体，再次陷入现代性制度依赖，处在各种规则制度编织的网络之中，遵循的是“结构的逻辑”。后工业时代，现代性自觉回应更高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风险性过程中，达到其当下发展的临界点，迈上一个新阶段，达到贝克所讲的“第二现代性”。第二现代性，也即自反性现代性，是非线性的，涉及规则探寻和反思性判断，遵循的是“流动的逻辑”，“与此前的第一现代性不同，第二现代性挑战而非理所当然地承认现代增长的基础，后者正被那些模糊、流动和不确定的事件所破坏”。贝克所提出的个体化理论指的是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也即自反性现代性的个体化，人们从第一现代性的社会范畴及其制度中抽离，处于流动的时代，过着快速流动的生活，“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孤独无依。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即不全是欧洲式的“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也不是完全“第一现代性”的个体化，而是兼具“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特征的“交叠型”的中国式个体化。目前中

① 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by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128.

③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④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的征途之中，第一现代性尚未确立，既无深植的民主文化，也没有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况且，迄今为止，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个体化也还没有在制度上被纳入基本权利体系（如家庭法、劳动法）”^①。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要是第一现代性的个体化，处在变革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解放政治”阶段。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全球消费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影响，加之中国第一现代性尚未确立，除了“自我”外，个体既无国家所靠，更无公民社会所依。“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奋斗、为自己而活与靠自己而活”便成为人们生存的信条，中国社会个体化又呈现出第二现代性的个体化特征，又需实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可以说，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处在“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个体化叠加的影响之下，是一种“交叠型”的中国式个体化。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和晚期现代的情形，中国的个人必须同时应对所有这些情形”。

在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交叉压力下，个体与国家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紧张，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必然亟需将“脱嵌”的个体“再嵌入”，或再整合到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中，找到具有确定性与安全感的温馨之“家”（roof）。目前，实现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再整合至少应从重塑个体与国家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借助国家整合与社会整合实现个体的“再嵌入”。

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疯狂的自由主义思潮强势扩张，现代性个体权利意识在广大农村迅速觉醒，春节期间人们基于个体考量的选择性拜年以及对神灵祖先祭祀的世俗化处理无不彰显着个体权利至上的第一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脱离传统束缚的个体在享有较大自由后体验到莫名的忧虑及不安全感，强烈诉求国家明确确认个体权利，要求国家供给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以及提供维持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然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规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却明显滞后。国家不能有效实现对个体的整合，生活在国家之中的个体缺乏安全感与确定性。

应对第一现代性个体化带来的问题，需要国家对个体进行整合。一方面是要加强国家基本制度供给，确立公平正义的首要制度价值，废除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健全完善有关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规范，将个体纳入国家制度范畴，给予个体权利以合法性与确定性；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个体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增进农民生活安全感，有效促进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强化国家认同，增强政府合法性。

同时，市场经济驱动的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个体化自然会对农耕文明下的传统社会产生逆反效应，人们纷纷走出各种各样的“祖荫”，摆脱传统社会思想观念与传统社会形式的束缚。从“祖荫”中抽离的个体，即失去了身体庇护的避难所，又找不到心灵抚慰的港湾，四处游荡寻找着自己的“床位”（beds）。但社会却没有提供更多的“床位”，社会无法实现对个体有效整合。在这个“无根”的社会中，个体过着“流动的生活”，承受着“流动的恐惧”。在快速流动的充满风险的开放时代里，每个个体都要“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村庄共同体意识快速弱化，公共精神日趋消解，身份认同不断解构，乡村社会展现出第二现代性个体化的属性。

针对乡村社会第二现代性个体化，应着重加强社会整合，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是要培育各种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生出公民社会，孕育出新社会规范与社会范畴，建立起流动的个体可以驻足的温馨“家园”；另一方面是开展农村社区公共活动，繁荣农村社区文化，促进个体农民间交往与合作，培育农村社区公共精神，累积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强化村庄共同体意识，增进个体归属感，建立社区身份认同。

责任编辑：张利明

^① 何美德、鲁纳 《“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徐烨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页。